

论四种类型的发展

杨建华

提要:增长与发展是发展社会学中一对极其重要的范畴,是把握社会发展现象之网的一个重要重要纽带,反映着社会发展普遍联系的一种形式,也是发展社会学研究的主要内容。本文以增长与发展关系为分析框架,提出了四种不同类型的发展:成长型发展、内卷型发展、退化型发展、无增长型发展。本文认为,发展与增长是一种相生相融、二律和合的关系:增长是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发展要求的增长是全面均衡、可持续的增长;增长是发展的基础,发展是增长的目的;单一经济增长并不一定与社会发展正相关,相反,其也有可能成为社会发展与稳定的破坏因素。

关键词: 增长 发展 类型

作者杨建华,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公共政策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浙江省社会学学会会长。(杭州 310007)

发展是人类社会永恒的主题,“发展”也构成每个国家不可剥夺的权利和我们这个时代的主题。对 21 世纪的中国来说,中华民族的复兴,中国的现代化,就将在这一个百年间实现。而发展,正是民族复兴和现代化的一项重要内容和基本主题。如何在这一发展进程中自觉而不是盲目、主动而不是被动、全面而不是片面、加速而不是延缓、顺利而不是曲折地去实施发展,如何避免“发展的异化”以及消除已经出现的“发展异化”的现象,是 21 世纪中国发展一个重大研究问题。

增长与发展是发展社会学中一对极其重要的范畴,是把握社会发展现象之网的一个重要重要纽带,反映着社会发展普遍联系的一种形式,也是发展社会学研究的主要内容。增长一般指社会财富的增长,包括一国生产的商品和劳务总量的增加,即国民生产总值(GNP)的增加或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增加。被定义为按可比价格计算的本期国内生产总值比上一个时期的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百分比。发展一般是指随着经济增长而促成的社会各领域多方面的变化,这些变化包括以个人为基础的社会关系出现从个人到社会总体的自由延伸,个人的自由延伸到社会整体关系层面,个人的物质及精神自由发展到社会层面,并取得社会化的一致。还有经济、人文、政治等一系列的社会存在的总体发展。

我们以增长与发展关系为分析框架,发现可区分出四种不同类型的发展:成长型发展、内卷型发展、退化型发展、无增长型发展。

发展类型 I:成长型发展。有增长,有发展;发展类型 II:内卷型发展。有增长,无发展、负发展或

高增长、低发展。发展类型Ⅲ：退化型发展。无增长，无发展或负增长、负发展。发展类型Ⅳ：无增长型发展。零增长、负增长，有发展，或乌托邦式发展；



下面我们就从第四种类型发展开始做逐一学理分析：

一、无增长型发展

这是一种零增长或无增长发展的形态。这种形态的发展有两种情况，一是零增长的类型，二是乌托邦式的发展。

(一) 零增长的发展

1968年，西方一些科学家、经济学家和新闻文化等界的名流聚集在罗马，讨论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各种问题，尤其是生态平衡问题。1972年，D. H. 麦多德等人发表《增长的极限》，他们选择了5个对人类命运具有决定意义的参数：人口、工业发展、粮食、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和污染，提出零增长理论。零增长论者主要从自然条件、资源、环境等方面论证经济增长的“极限”，或者从社会经济角度论证经济增长是不可取的，不值得的。根据零增长理论，就世界各国目前的生产技术、生产能力，如果经济不受阻碍地继续增长下去，那么到2100年，将会出现极度环境污染，粮食匮乏，人口过多，自然资源耗尽，从而进入“世界的末日”，人类将最终毁灭。地球是有限的，人类必须自觉的抑制增长，否则随之而来的将是人类社会的崩溃这一结论。因此，必须实现零经济增长率，以使世界保持生态平衡。

零增长理论在世界上引起广泛的争论。美国学者西蒙1981年发表了《最后的资源》一书，他抨击了罗马俱乐部研究问题的方法，认为人类资源没有尽头，恶化只是工业化过程中的暂时现象，人口将在未来自然达到平衡。他说：“我并不相信自然界是无限丰富的，我倒是相信，最大的可能是凭借现有的知识和将要增长的知识，我们和我们的后代能够获得所需要和渴望得到的原材料……我们富有的是人的思想和情感。”^①他是说人类科学技术的进步是无限的，可供人类开发利用的自然资源也是无限的。人类在发展极限挑战面前，能够依靠科学技术和创新能力，实现没有极限的增长。还有一些反对者认为，零经济增长只不过使人类稍推迟“世界末日”的到来，不仅不能达到生态平衡的目的，还会将大大加剧社会不平等，没有技术创新，人们进取的积极性消失，社会效率会大大降低。同时，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根据本身的利益也都不会愿意实行零增长。零增长既是不能实现的，也是不应该实现的，零经济增长也不可能在全世界范围内实现。其实，增长还是有极限的。这既包括速度，也包括总体资源。尽管有两种因素会缓解这种加速和危机，一是科学技术的进步，可以减少消耗、污染和浪费，并且可以生产出替代品；二是加强环境保护和生态治理，使之朝着优化方面发展。但是，缓解危机是一码事，危机的存在和积累则是另一码事。因此，要实现可持续发展，有些方面还必须实现零增长。如实现能源资源消耗“零增长”与生态环境退化“零增长”。要从根本上扭转不择手段地占有环境这一

^① 西蒙：《没有极限的增长》，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34页。

“公共财物”的现象,克服对自然资源的掠夺,获得迈进可持续发展的高门槛。

(二)乌托邦式的发展

乌托邦是人类的一种理想,但乌托邦式的发展却是一种灾难性发展。斯科特《国家的视角》一书翔实分析了这种乌托邦式发展灾难性状况。从苏维埃的集体化,中国的“大跃进”、德国的科学林业,巴西的巴西利亚城市规划和坦桑尼亚的乡村改造,埃塞俄比亚理想的的国家村庄,等等,都是这些极端现代主义乌托邦项目的典型代表。

乌托邦抱负本身并不注定就是魔咒,乌托邦本身并不可怕,但当乌托邦幻想掌握在一些不承诺民主或公民权利的政治精英手中,乌托邦式的发展就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我们审视这些失败的乌托邦式的发展就会发现,尽管打着造福人民的旗号,但它们里面的“人民”始终是异常抽象的可以互换的主体,他们没有性别、品味、传统,也没有价值和特定的个性,它们在构想设计阶段的高度抽象就已经埋下了今后失败的种子。在苏维埃的集体化、坦桑尼亚和埃塞阿比亚的村庄化中,我们看到,“革命的建筑师和工程师”们开始毫无节制地使用国家权力来改造人们的习惯、工作、生活,甚至道德行为和世界观,农民对官方规划的反抗被归结为进步与愚昧、理性与迷信、科学与宗教之间的斗争而遭到粗暴的镇压,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那些乌托邦式的发展目的本身出现了严重的偏差,它们不再是为了人民的福利,而是变成了为精英所垄断的试图理性地控制自然和社会的“社会工程”。

那么,面对现代性始终存在的可能导致灾难的风险,我们应该如何应对?斯科特认为我们在实践中要摒弃那种致命的自负,不仅在理念上更加关注地方性的实践知识,而且在行动中采取更加细致和谨慎的方式来落实我们的理想。他说:“基于经验也可以得出几条法则,如果遵循它,也可以使发展避免走向灾难。”^①这几条法则是,小步走,鼓励可逆性,为意外情况做计划,为人类创造力做计划。

二、退化型发展

这是一种既无增长也无发展的类型。退化型发展表现在经济增长停滞甚至倒退,创新乏力,制度缺失,民不聊生,政治混乱,社会发展停滞不前。其一个较典型的案例就是前苏联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状况。长期来,前苏联经济一直是粗放型的经济,即主要通过大规模地建设新的生产能力,不断地增加劳动力和开发资源来保证经济的增长。进入七十年代以来,粗放因素日益受到限制。这在客观上迫使前苏联当局改变传统的粗放经营方式,而转向集约化的方针,即主要通过加速科技进步来提高经济效率。但前苏联“十五计划”时期劳动生产率增长速度下降,国民经济各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增长幅度,低于“九五”计划的实际增长水平。

为什么会发生退化型发展?退化型发展发生首先在于经济障碍。1956年,美国经济学家纳尔逊发表了《不发达国家的一种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一文,利用数学模型分别考察了不发达国家人均资本、人口增长、产出增长与人均收入增长的关系,并综合研究了在人均收入和人口按不同速率增长的情况下人均资本的增长与资本形成问题,从而形成了“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发展中国家贫困落后的主要原因是人均收入过低,导致储蓄能力过低、投资量小和资本形成不足;而人均收入低的原因又在于资本形成不足。1957年,缪尔达尔出版了《富国与穷国》一书,他认为在欠发达的国家,由于人均收入水平低,导致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低下,营养不良、医疗卫生状况恶化,健康受损,教育水平低下,从而使人口质量下降,劳动力素质不高、就业困难;劳动力素质不高导致劳动生产力难以得到提高,生产

^① 斯科特:《国家的视角》,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442页。

效率低下；劳动生产率低使产出增长停滞或下降，最终，低产出导致低收入，低收入进一步强化了经济贫困，使发展中国家总是陷入低收入与贫困的累积性循环困境之中。

其次是制度缺陷造成资源不能有效配置。经济增长以提高生产效率为前提，生产效率就是以最少的资源创造最大的价值，提高效率有两种途径：一种是资源有效配置，另一种靠技术创新。资源的有效配置就是资源在某种机制的作用下自发流到有效率的部门。制度缺陷造成资源不能有效配置，一方面资源流到了低效率部门，另一方面资源不能流到高效率部门。以诺思为代表的经济增长制度决定论者并不否认技术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而是进一步分析技术进步的动力。在其著作《经济史上的结构与变革》(1990)中，他将技术变化速度的差异归结为巨大的市场规模和完善的产权，而这两个因素本质上都具有制度的特征。由于技术进步具有明显的正外部效应，缺乏对技术创新有效的产权保护必然导致创新不足。“技术变革速度缓慢的主要原因就在于，直到相当晚近的时期都未能创新发展出一整套产权”(制度)。^①

第三是技术创新停滞。当技术创新停滞、劳动生产率无法进一步提高时，处于下游的生产环节把资源转化为更高价值商品的能力已经发挥到了极致，已无潜力可挖，生产企业只有扩大规模才能保持竞争力，而这会增加对上游资源的需求，进而推升资源价格，企业家们会发现通过扩大规模而降低的生产成本，最终会被进一步提高的资源价格吞食。

第四是制度与政治障碍。刘易斯认为：“在9种情况下政府可能会使经济停滞或下降，这就是：维持不了秩序，对公民进行掠夺，鼓动一个阶级剥削另一个阶级，阻碍对外交流，忽视公共服务，过分放任自流，控制过严，花钱过多和进行劳民伤财的战争。”^②一些国家由于经历了长期的国内政局的不稳定，长期的战乱，或是政府的更迭频繁。在现实中，一些经济上贫困落后、经济增长缓慢、人们生活水平低下的发展中国家，还采取闭关锁国政策，这包括对外贸易的萎缩，也包括人员交流的萎缩，还包括技术引进的减少，以及对外资引进的减少。这些因素都阻碍了经济的发展。

一些国家的制度安排不足，政治和法律制度常常是不完整或落后的，各种寻租行为和腐败行为盛行。一些国家的庞大政权体系和官僚阶层不仅耗费了巨额的财政收入，导致用于经济建设的资金难以积累起来；事实上，在那些政治、吏治腐败的国家中，国内大量的资源处于闲置、浪费状态，或不能人尽其才，物尽其用，地尽其利，使资源的使用效率低下，资源再多，也因制度的无序而导致浪费，而政治体制的腐败往往对经济体制的改革形成阻力。一国没有这种社会、政治和经济制度的相应变革，经济与社会的发展往往是不可能的。

第五是极端现代化意识形态。人的经济行为与其他行为一样，受其思想观念支配，受其思想心理驱使。先进思想对经济发展和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反之则相反。发展，首先是思想上的发展。任何一个民族、国家、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都离不开一定的人文精神作其支撑。马克思·韦伯就曾深刻地揭示出，英国、荷兰等国家之所以能成为现代化的先行者，就同这些国家的人们具有源自新教伦理的一种特殊的文化精神气质有着密切的关系。韦伯认为，新教伦理是欧洲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精神动力。韦伯指出，与资本主义理性经济行为相配合的是一套独具特色的精神气质，合理地有计划地持续追求预期利润的态度，就是资本主义精神的本质。他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命题：经济增长依赖于资本主义积累；而资本主义积累又依赖于资本主义企业家阶级；但只有在具有一套恰当的宗教价值观、公民美德和制度的条件下，企业家才可能变得活跃起来。^③ 二战以后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以民族主义精

^① 诺思：《经济史上的结构与变革》，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186页。

^② 刘易斯：《经济增长理论》，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502页。

^③ 转引自[德]柯武刚、史曼飞：《制度经济学——社会秩序与公共政策》，商务印书馆，2000年，第25页。

神和发展至上的意识形态作为现代化的内在动力,充分激发和调动传统文化资源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更是成为后发国家和地区现代化的成功范例。改革开放后,我们从“左”的、姓“社”姓“资”、姓“公”姓“私”等思想束缚中解放出来,极大地解放了社会生产力,促进了各种所有制经济成分的发展。

但极端现代化意识形态却会影响、制约甚至毁坏发展。耶鲁大学人类学教授斯科特在《国家的视角》一书对此作了深刻分析。斯科特提出,为什么那些试图改善人类命运的大型国家项目都失败了?一些大型工程项目如德国的林业科学化运动、前苏联的集体农庄、坦桑尼亚的贾乌玛运动和巴西利亚城市规划等等,不仅没有为人类带来幸福而且导致大规模的灾难。他认为,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极端现代化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也可以说是一种强烈而固执的自信,他们对科学和技术的进步、生产能力的扩大、人们的需求得到不断的满足,以及对自然(包括人类社会)的掌握有很强烈的信心。他们特别相信,随着科学的掌握自然规律,人们可以理性地设计社会的秩序”^①。

三、内卷型发展

这是一种有增长而无发展、负发展或者是高增长低发展的类型,我们以内卷型发展名之。英文词“involution”,一译“内卷化”,一译“过密化”。吉尔茨通过对印度尼西亚的实地考察发现,在爪哇岛和外岛之间存在着二元发展:爪哇岛聚集了印尼 2/3 的人口,主要从事粮食生产和小型手工业;散布在爪哇以外的外岛广阔区域内,殖民者在那里建成了高效率、大规模的出口工业基地;爪哇岛人由于缺乏资本,土地数量有限,再加上行政性障碍,无法将农业向外延扩展,致使劳动力不断填充到有限的水稻生产中,朝向劳动密集型方向发展。而外岛的一些地区借助于技术进步,生产朝向资本密集型方向发展。于是吉尔茨提出了“农业内卷化”的概念^②。它是指在土地面积有限的情况下,增长的劳动力不断进入农业生产的过程,主要特征是劳动密集化、系统内部精细化和复杂化。

黄宗智与杜赞奇发展了吉尔茨的“内卷化”概念。他们把这一概念应用于中国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的研究。黄宗智把通过在有限的土地上投入大量的劳动力来获得总产量增长的方式,即单位劳动的边际效益递减的方式,称为“没有发展的增长”,并称之为“过密化”^③。他提出,中国的商品经济发展与糊口农业共存,商品化并未推动经济结构转型,反而加固了糊口农业中单位土地上投入的劳动力的“过密化”程度。杜赞奇则在《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指出“内卷”是“指一种社会或文化模式在某一发展阶段达到一种确定的形式后,便停滞不前或无法转化为另一种高级模式的现象”^④。并提出了“国家政权内卷化”概念,即不成功的或背离现代国家政权建设目标的失效行为,也就是“政权的正式机构与非正式机构同步增长”,国家徒有扩张,没有收益。^⑤

社会学多用“内卷化”来指称“没有发展的增长”。它既可以指一种现象,也可以指一种机理。这种机理一旦定型,进入“锁定”状态,就会成为恶性的路径依赖,内部的结构更新和制度创新很难发生。这是一种典型的发展悖论,“没有发展的增长”,“没有发展的商品化”,“没有公民权利发展的公众领域扩张”,“没有民主发展的市场化”等等。^⑥ 这种发展悖论还表现在 1996 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人类发展报告》所指出的几种有增长而无发展的情况上:(1)无工作的增长,经济增长较快并不一定增加就业

① 斯科特:《国家的视角》,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4—5页。

② 刘世定、邱泽奇:《内卷化概念辨析》,《社会学研究》2004年第5期,第96—110页。

③ 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华书局,2000年,第11页。

④ 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前言》,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

⑤ 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51、172页。

⑥ 黄宗智:《经验与理论:中国社会、经济与法律的实践历史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2—90页。

机会。(2)无声的增长。物质的发展使人失去了人性,人成为物、工具,民众缺乏参与和管理公共事务。(3)无情的增长。在很多发展中国家,虽然经济增长较快,但收入分配不平等反而更加严重了。(4)无根的增长。忽视文化的重要性,其结果往往是严重的民族和种族冲突。(5)无未来的增长。不顾自然资源耗竭和人类居住环境恶化而换来的增长是不可取的。后来,又有学者加了两条,一是低头的增长,即依附型增长,将导致不可持续的经济现象;二是失控的增长现象,如鼓吹市场神话和公共品市场化,这被称为不受约束的增长、漫无目标的增长、无政府状态的增长。^①

内卷型发展揭示了增长可能带来高速的经济增长,但高速增长也可能带来有增长无发展问题。这种内卷型发展是无效益或零效益情况下的经济增长,如中国古代,在有限的土地上投入大量的劳动力来获得单位面积和总产量增长,而人均降低,边际效应递减。前苏联经济也是采用外延粗放经营,数量不断增加,质量却很低劣,技术进步投入低,经济效益低,经济增长以浪费资源和破坏环境为代价。我国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的大跃进和当前中国经济增长,经济外延型增长模式比较明显,发展质量比较低,很多建筑寿命比较短,环境污染严重,经济结构没有改善甚至恶化。李培林等学者提出,中国国企的运行逻辑存在两个相互抵牾的目标:追求效用和利益最大化,追求福利最大化。这两个目标迫使国企朝着功能内卷化和人员过度化方向发展,以致负担过重,冗员过多,徒有消耗而无发展^②,人民不能共同分享经济增长成果。联合国《1998年人类发展报告》指出,非洲、拉丁美洲、亚洲部分国家的贫困日益加深,1997年富裕国家的人口仅占全球人口的两成,却消费掉全球八成六的商品和劳务,而最贫困的两成人口则只享受到全球1.3%的消费。拉美国家在20世纪70年代,基尼系数高达0.44~0.66,巴西在90年代末仍高达0.64。一些国家还由于贫富悬殊,社会严重分化,引发激烈的社会动荡,甚至政权更迭,对经济发展造成严重影响。

因此,必须从增长与发展的统一上推动经济的整体发展。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实践提供了处理增长与发展之间关系的经验教训。增长虽然是发展的前提,但是对国民生产总值的片面追求带来的并不是广大人民群众所期望的结果;经济增长了而社会领域无任何进展甚至倒退的状况,经济增长并不同时意味着社会发展,只有将经济增长与社会领域的进步统一起来,经济的增长才是真正的发展。发展中国家以“满足人的基本需求和消灭贫困”为宗旨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制定和实施,深刻表明了“人的发展”是统一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的联结点。没有人的发展,所谓的发展就会流于空谈。发展中国家必须从增长与发展的统一上寻求发展。国民生产总值、经济结构、经济效率、社会进步的因素都必须在发展的机体内生长。发展既是量的不断增长,也是结构的不断优化,既是有效使用、合理配置资源,保护生态环境,也是实行社会公正,使人民群众受益,有利于社会的发展。

四、成长型发展

这是一种既有增长,也有发展,是发展的一种理想类型。成长型发展特点主要有:

(一)人本性发展

成长型发展是一种以人为本的发展。社会发展,是人类理想实现的一个过程,是各个国家立足于现状、实行社会变迁的高度自觉,是多领域、多重目标的综合体系,它的最终指向是国民的生活质量。发展的最高尺度就是发展的人民性。

人本性发展意味着社会发展的核心是人的发展。社会发展要通过人的发展加以体现和衡量。社

^① 杨万东:《人本发展实际上就是民本发展》,《人民论坛》2011年第5期。

^② 李培林、张翼:《国有企业社会成本分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23页。

会是人的社会,人是社会发展的主体。从运动和发展的角度看,社会 and 人的辩证统一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就是社会在矛盾运动中不断进步和人从社会进步中逐步获得发展的过程。社会发展是人的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它人为人的发展提供良好的社会条件,社会内部生产力的发展、科技的进步、社会形态的变化,归根到底要促进人的解放和人的自由的发展;而人的发展反过来能积极促进社会的自我完善和更新,人的发展程度成为衡量社会发展的根本标志。

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其人性追求日益凸显。这反映了人类文明的新觉醒。人的发展,包括反映人的生存和享受需要的生活质量,反映人的发展需要并将个性发展融入于其中的人的素质的提高以及人的价值的实现等方面。具体说,人的发展有四个方面:人的物质、文化、生态需要的满足;人的能力的充分发挥;人的个性得到发展;人的素质得到全面提高。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说:“通过社会生产,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①

人性发展也意味着发展的最高尺度是人民性。现代社会是一个以民为主的社会,也就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人民既是社会发展的建设者,又是实现社会发展而最终为之服务的目标和对象,让人民充分地参与和分享发展的成果是发展的最高尺度。目前是代价主体与获益主体的分离,这不符合人性的原则。应尽最大限度减少人民分担的发展、改革的成本和代价,尽可能多地参与发展的整个过程,让人民尽可能多地分享发展的资源和成果,满足人民的基本需求,如就业需求、安全需求、教育需求、保障需求、文化消费需求、人的尊严需求等,以最大程度地体现人文关怀和发展的人性。

人性发展还意味着发展的永恒价值是社会公正。社会公正观念源远流长,无论是在西方的文化,还是中国的传统文化中,都占据着重要的地位。社会公正是一项社会最基础层面的道德,是一种贯通中西的最基本的普适的永恒价值。社会主义是以社会公正、社会公平为自己的旗帜的,宽容与自由,民主与参与,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对不愉快多数的特别关怀,不断满足大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等等,这些标志着人类进步的里程碑的内容,正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和内在要求。尤其是在全球环境恶化、经济两极分化的条件下,更需要具有社会主义精神的组织来实现这些要求。社会公正意味着起点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以及一定程度上的结果平等。我国是一个后发的社会主义国家。后发意味着我国不能采用西方发达国家先通过掠夺式发展模式,在很短时间内达到较高发展阶段,然后才去关注社会公正,关注人的生活质量。事实证明这种做法是不可取的,因为西方对发展成果兑现的滞后关注已经造成了许多发展性危机。另外,我国社会主义性质也决定了我们不能像早期资本主义社会那样只在小范围内体现社会公正,而必须一开始就最大限度地使社会公正在每个社会成员身上得到兑现。这是中国社会发展战略的核心和本质内容,是我们实现现代化的终极目标和追求。

(二)均衡性发展

成长型发展是一种均衡协调的发展。发展的均衡性不是小农社会所追求的均平性,也不是乌托邦理念中的大同性,而是指社会的协调和人民的和谐,也就是社会学意义上所说的社会结构的合理性和社会运行的协调性。均衡地推进城市与乡村、发达区域与不发达区域、经济与社会之间的发展,合理地分配社会财富,消除贫困,防止两极分化。发展的均衡性是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如果一种发展模式导致了区域结构、城乡结构、贫富结构失衡,导致两极分化和贫困化,穷人无法合理地分享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成果,那么,这种发展模式既达不到人们所期望的社会目标,同时也必将导致许多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36页。

社会问题,进而使发展也难以持续。

因此,发展的均衡性至少包含着这样四个含义:

一是区域、社会间发展的均衡。这包括城乡之间、东西之间以及国际上的南北之间。也就是说,均衡发展首先是指我们这个地球上全体居民都能得到公平均衡的发展。就一国而言,既包括发达地区的发展,也包括欠发达地区的发展;就世界而言既包括发达国家的发展,也包括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在全球化的发展中,应遵循合作促进发展的理念,在尊重其他区域和社会完整性的基础上,社会去促进自己成员的发展,一个区域和社会的发展不应以损害另一个区域和社会的发展为前提。

二是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均衡。毋庸置疑,经济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基础和前提,只有经济发展了,才能给社会提供强大的物质力量,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但是,经济发展不可能脱离社会发展而长期单独推进,经济发展不可能自然地增进全体人民的福祉。发展的实践已经证明,一方面,要实现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就必须提高劳动生产率,优化产业结构,提高整体经济质量。这些都有赖于科技、教育、文化等的发展,有赖于人的素质的提高;另一方面,要实现经济快速、健康发展,还必须有一个安全、秩序、稳定的社会环境,这包括合理的社会结构,良好的市场秩序,公正的制度保障。同时,从根本意义上说,社会发展也是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因为,人们从事生产和其它经济活动,归根到底是为了满足人们的多种需要,改善人们的生活环境,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很显然,经济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前提和条件,社会发展又是经济发展的动力和目的。因此,两者的均衡发展是消除发展异化的重要方式。

三是弱势群体与强势群体发展的均衡。即发展对于社会所有成员都有同样的可能性,也就是每个人都应同样有实现其自身发展的机会,一个人的发展不应以压制另一个人的发展为前提。一方面要确保民众发展机会的均等,另一方面要大力消除贫困,努力“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建构一种合理、良性的社会结构。我们的发展模式不能以给后人留下一个不合理的社会结构和严重的社会问题为代价。因此,必须坚持以“和谐”为灵魂,以“公平”为准则的均衡发展道路,努力从不均衡走向均衡,使社会更加和谐、更加稳定,更具有抵御各种风险的能力,只有这样才能确保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四是人与自然发展的均衡。一方面,我们要迅速地发展经济、增强综合国力、摆脱贫困落后的状况。另一方面,我们要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不但要确保环境不受到损害,而且要逐步提高环境的承载力。因此,我们需要探索一条前人没有走过的发展道路,既不是古代的“天人合一”的重复,也不是西方国家“征服自然”的翻版,而是一个符合中国国情,符合世界潮流的人与自然和谐均衡的发展。

(三)创新型发展

成长型发展还是一种以创新驱动的发展。创新是总体各要素的发展性总合,创新作为一种总合,本质上讲是发展性组合,也就是结构与体制等机制方面的变革。产业革命就是这样的发展性组合即机制性变革。熊彼特把这种创新称为“创造性破坏”,他说:“它不段地从内部使这个经济结构革命化,不断地破坏旧结构,不断地创造新结构。”^①

成长型发展的本质是创新,否则,“成长型发展”就只能停滞于“增长”的层面意义。“成长型发展”是“创新”的内涵,“创新”是“成长型发展”的本质。凡发展必有创新,凡创新必有发展。发展和创新是同一事物的同一过程或同一行为,二者互相规定。“发展”和“创新”可以作为同一范畴使用。因此,发展的本质是一种创新活动,经济体系从一种均衡走向另一种均衡的发展,其根源就在于创新活动。

创新包括产品创新、技术创新、体制创新、制度创新、社会创新等。在平稳发展时期,发展创新的

^① 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147页。

根本特征就是优化结构和体制。产品的升级换代,可以提升企业竞争力,体制结构创新优化,可以获得均衡效益。熊彼特把创新与周期联系在一起,认为经济周期的旧阶段进化到新阶段,或旧的均衡位置进化到新的均衡位置,决定性的因素在于创新。

创新除了经济内容之外,还有社会创新。德国社会学家沃尔夫冈·查普夫说:“社会创新是达到目标的新的途径,特别是那些改变社会变迁方向的新的组织形式、新的控制方式和新的生活方式,它们比以往的实践更好地解决问题,因此值得模仿,值得制度化。”^①在这,一些新的事物,一种新的思想、做法或事务,新的工具或活动,在这个意义上,无论是新的机器还是新的组织形式都是创新,只要它们在涉及普遍接受的目标时,诸如健康或满意,能够帮助人们实现目标(如更好的治理社会问题)。创新是以新的物质技术和社会技术,帮助我们更好地满足需求,更好的解决社会问题。社会创新就包括新的组织形式、新的控制方式和新的生活方式。

因此,可以说成长型发展是一种人本、均衡、创新的发展,是一种全面、真实、持久的发展,是人与自然、经济与社会、效率与公平、弱势群体与强势群体的和谐发展,是基于社会自身基本需要和资源内生自发发展,是社会生活全面综合的整体发展,也是以人为目的的社会发展。

从以上发展的四种形态分析来看,我们认为,发展与增长是一种相生相融、二律和合的关系,理想类型的发展也正是有增长也有发展。在成长性发展中,增长与发展的关系大致是:

第一,增长是发展的前提和基础。经济增长本身就是一种发展。发展的基础和前提是经济增长。增长是发展的基础,没有经济增长,很难有发展,国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经济结构和社会形态等的进步也都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经济增长。人类生存追求最终目标是幸福,尽管幸福是一种心理感受,但是,物质是这种感受产生的基础,对财富的占有和享有是产生幸福的基本前提。财富增加未必就能促进全社会幸福指数的提高,但没有财富的增加,就不可能有全社会幸福指数长期持续提升;经济增长未必就带来财富增加,但没有经济增长肯定不会有财富增加;经济增长未必就能带来社会发展,但没有经济增长肯定不会有社会发展。增长是重要的,因为经济增长的影响并不仅仅是经济意义上的,经济体系、社会体系和政治体系在一个社会中相互依赖,如果其中一个部分变化太快,很可能导致社会其他部分的不稳定。

第二,发展要求的增长是全面均衡、可持续的增长。理论与实践经验都表明,增长不等于发展,经济增长只是缓解贫困、实现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绝不是充分条件。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发展往往呈现马太效应,发展得快的地区和领域,发展得更快,发展得慢的地区和领域,发展得更慢。经验表明,一个地区的现代化繁荣程度、人民富裕程度,与当地社会发展水平密切相关。为了实现共同繁荣和富裕,必须推动社会全面发展,在中国则表现为城市和乡村共同发展,东、中、西部共同发展,南北共同发展,沿海和内地共同发展,至少是地区间、城乡间的发展差距,不能在发展过程中变得越来越大。同时,人类理性、仁爱的本能,要求我们的发展向子孙和未来负责,发展要具有可持续性。我们拥有的资源是有限的,还要把有限资源留给子孙,单纯通过消耗资源规模扩张型发展不具有持续性,在消耗资源同时破坏了环境、伤害了资源,也不具有可持续性,所以,发展必须变资源消费、规模扩张、环境破坏型为资源节约、内涵扩张、环境友好型,通过变革经济增长方式,走内涵式发展道路。

第三,增长是发展的基础,发展是增长的目的。发展的目的要求在发展结果的分配和享用上体现公平和公正。注重经济增长的结果的分配和使用,首先体现了发展的目的。创造财富是为了占有和享受财富带来的幸福,由谁占有、占有多少,这既要体现效率原则,更要体现公平和公正的思想。劳动

^① 查普夫:《现代化与社会转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22页。

是人类共有的权利,享有劳动成果也是人类共有的权利,人类生而平等,但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面临的约束条件迥异,财富是不同个体在不同岗位共同劳动成果,只有在效率原则前提下注重公平、向弱者倾斜,才能最大程度实现享有财富边际效用最大化,最终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社会发展最终还要表现为贫困群体减少,基尼系数尽可能小些。不少研究表明:不平等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尤其是财产的不平等。如果不平等因素是体制性因素所致,那么这种不平等就可能中断经济增长。世界银行2006年《公平与发展》报告就提醒人们注意经济、政治和社会的代际传递,以及机会和政治不平等对发展的负面影响,避免形成“不平等陷阱”。在这个意义上,旨在促进平等的政策措施,并不仅仅是经济增长的附属物,而是它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少发展中国家过分注重增长而不注重发展,结果出现了“高增长、低发展”或者是“有增长,无发展”。相反,有发展一般来说都会有增长,即使零增长,也是一种有发展的零增长,是一种社会结构、社会类型、社会环境以及人自身优化、改善与提升。例如,通过产品结构和产业结构的优化调整,即使投入不增加,总产量和总产值仍然会增长。

第四,单一经济增长并不是与社会发展相正相关的,相反,其有可能成为社会发展与稳定的破坏因素。托克维尔在其《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指出:“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人们耐心忍受着苦难,以为这是不可避免的,但一旦有人出主意想消除苦难时,它就变得无法忍受了。”^①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也指出,公平报酬和公平差距的衡量原则问题将是后工业社会中最令人烦恼的问题之一。他进一步解释道,随着收入差距的缩小,随着民主更加明确,对平等的期望会快速增加,而且人们会进行更加令人反感的比较;换言之,“痛苦的确已经减轻,但是感觉却更加敏锐^②”。这也就是“托克维尔效应”,即受苦少了,束缚少了,敏感度却提高了,余下的痛苦与束缚就越发难于容忍。

从以上发展的四种类型分析中,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增长更多是“量”的变化,发展一般是“质”的提升;增长是明确的、可度量的,只计算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百分比,发展很难用几个指标去界定,发展不仅包括经济增长的速度、增长的平稳程度和结果,而且还包括国民的平均生活质量,如教育水平、健康卫生标准等,以及整个经济结构、社会结构、文化、政治等的总体进步;增长具有单一性,往往可以单兵突进,但很难持续,而发展具有总体性,需要总体协同,但可以持续和加速发展;增长的机制是积累,发展的机制是创新。

增长与发展区别还表现在理念不同、方式不同等。增长以经济总量增长为指导,注重经济增长的速度与总量的扩张。发展理念是社会公平正义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注重发展质量的提高与社会结构的改善。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强调重视满足人的需要和公众福利的增加,社会整体综合发展,包括政治的人权和自由、经济上的生活质量提升、文化上的国民受教育程度提高、精神文化的极大丰富等全面演进过程。

责任编辑:张平

^{①②}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216、216页。